

【论 文】

后殖民主义文化研究视野中的美国本土藏学批判¹

沈卫荣²

一、

年岁见长，难免怀旧。近日喜听老歌，崔健的一曲《浪子归》，听了一遍又一遍，越听越入味，越听越入戏，有时忍不住还自顾自地吟唱起来，无端生出很多“酸的馒头”（sentimental）来。遥想当年初听此曲时，少年不识愁滋味，还听不出“岁月匆匆似流水，它一去不再回”的无奈。今日再听，却袭来愁绪满怀，弹指间，原来已经三十余年过去了，却道天凉好个秋！

初听《浪子归》时，我刚开始学藏文，雄心勃勃要推开藏学这扇沉重的大门；此后，转战南北东西，于今可算是藏学界当仁不让的一员老兵。然受累世习气和世间八风所碍，迄今既未有证悟，亦无所成就。回眸过去，往事如烟，难免五味杂陈，感慨万千。仿佛突然间重又回到了那扇沉重的大门口，兀自推门而入，却见门内景象，早已与三十余年前所见迥然不同。准歌中所云，“面对镜子我偷偷地窥，岁月已上眉，不忍再看见镜中的我，过去已破碎。”

却无奈古德有言在先，“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故虽不忍再看，但禁不住还要放眼远眺一番。不指望能独具慧眼，将这个曾经魂牵梦萦的象牙塔或香格里拉彻底看个明白，但求能独善其身，知道自己目前身落何处，不至于完全迷失在这风云变幻的学术江湖之中。

二、

初入藏学之门时，中国与世界的联结远不像今天这么紧密，我对海外藏学的了解不多。当年的藏学也远不如今天这么热闹，公认的大家寥寥可数，我知道的只有意大利的图齐（Giuseppe Tucci, 1894-1984）、毕达克（Luciano Petech, 1914-2010）、英国的黎吉生（Hugh Richardson, 1905-2000）、法国的石泰安（Rolf Stein, 1911-1999）、德国的霍夫曼（Helmut Hoffmann, 1912-1992）、匈牙利的乌瑞（Geza Uray, 1921-1991）等等不多的几位。他们全都是欧洲学者，虽然学术各有专攻，也各有各的卓越，但大概都可以被认为是杰出的历史学家，或者亦可以把他们归类为东方语文学家（oriental philologists），抑或文本语文学家（textual philologists）。不管他们研究的是哪个专题，其所采用的学术方法严格说来都是欧洲学术传统中的语文学。我本科读历史学专业，进入藏学的缘分源自对蒙古时代之西藏历史的兴趣，当时从蒙元史转入藏学的入门训练，除了跟随王尧（1928-2015）老师学习藏文外，就是阅读和翻译上述这些藏学大家们的著作。我对他们的学术成就推崇备至，对欧洲传统的语文学方法也心悦诚服，真心觉得他们是学界翘楚、人生榜样，他们所做的这种历史学和语文学的学问（historical and philological approach）就应该是藏学研究之正宗。

可是，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特别是进入新世纪以后，藏学的面貌于国际学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一方面，藏学研究机构和藏学家的数量激增，特别是中国和美国之西藏研究队伍的异军突起，严重改变了世界藏学的传统格局；另一方面，藏学从学术方法到研究领域，均日趋

¹ 本文发表于澎湃新闻网之《上海书评》2018年8月23、24、25日号。

² 作者为 清华大学 人文高等研究院 教授。



丰富和多元，令人眼花缭乱，无所适从。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研究取径显然已不再是国际藏学研究中一枝独秀的主流传统，上述这几位藏学大家和他们所代表的学术传统渐渐失去了绝对的权威地位，已不再是国际藏学界之公共视野的聚焦点。随着西方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浪潮的兴起，上述这一代学人所代表的欧洲东方学传统成为后辈同行学者们激进地批判和解构的对象，其学术中隐藏着的东方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本质，得到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这一代学术大师们普遍具有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背景和身份，使得他们作为一代学术大师的人格魅力和俾倪天下的学术成就立马黯然失色，失去了往日熠熠照人的光辉。

例如，被公认为二十世纪世界上最伟大的西藏学家的图齐先生在其身后却遭遇了滑铁卢，他的学术人生的另一面被人无情地揭露了出来，说他原本竟然是一位活跃的纳粹分子，曾经是墨索里尼纳粹政府要员的亲信，还曾经用力地吹捧过日本军国主义；¹而最早对吐蕃金石碑铭做了非常出色的研究的黎吉生先生，其政治身份本来就众所周知，他是英帝国主义直接派驻西藏的殖民官员，而他以前并不广为人知的丑事后来也被揭露了出来，他不仅要为热振活佛遇害承担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还可能也与根敦群培受难有直接的牵连。²而霍夫曼本人在二战期间曾是希特勒纳粹政府建立的、直接以宣传雅利安人种之优越为宗旨的“祖先遗产研究院”的研究人员，和纳粹的关系十分密切，他研究西藏的动机与纳粹的意识形态有脱不开的干系。³总而言之，在我曾经十分推崇的那一批藏学大家中有很多人都有一个在政治上不很光彩的过去。

不仅如此，整体而言，西方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接受和表述自古以来就是在西方自身之政治和社会背景的影响和主导下的一种人为的想象和建构，它们不但始终受到了西方之政治、权力和利益的沾染，而且与现实的、物质的西藏从来就没有必然的联系。西方的藏学研究无始以来就与欧洲的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有直接和紧密的关联。被人称为“藏学之父”的匈牙利学者乔玛（Alexander Csoma de Körös, 1784/8-1842）原来是一位激进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者，他的东方寻根之旅本来是受民族主义的驱使，最终却被一位英国殖民主义者引导到了藏人居住的拉达克地区，他所开创的西藏研究从一开始就是直接为英帝国主义者日后侵略西藏的政治和军事目的服务的。而乔玛之后的西方藏学家们，不管他们的学术能力是如何的出色，但都从未能够摆脱不同时期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和政治舆论对他们的束缚和影响，其学术研究凸显出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本质。

自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西方后现代、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家们借助萨义德（Edward Said, 1935-2003）先生创立的“东方主义”（Orientalism）理论这个批判的武器，对西方前辈东方学家们及其学术研究成就进行了激烈的批判和解构，这对于反思西方的思想史和学术史，清算其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流毒，无疑具有十分进步和积极的意义。但是，这种清算对于西方的东方学传统而言，它几乎可以说是一种弑父式的暴力行为。随着那些曾经风光无限的学术权威们被一个个地拉下神坛，他们所传承的那种优秀的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学术传统也黯然失色，甚至惨遭

¹ 对图齐的批判参见 Gustavo Benavides, “Giuseppe Tucci, or Buddhism in the Age of Fascism,” *Curators of the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Donald S. Lopez, Jr. ed., The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95, pp. 161-196; Enrica Garzilli, *Mussolini's Explorer: The Adventures of Giuseppe Tucci and Italian Policy in the Orient from Mussolini to Andreotti. With the Correspondence of Giulio Andreotti*. (Volume 1), Asiatica Association, 2016.

² 他的主要著作有: *A corpus of Early Tibetan Inscriptions*. (James G. Forlong Series no. 29), Hertford: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85; *High peaks, pure earth: collected writings on Tibetan history and culture*, Serindia publications, London, 1998. 关于他和热振事变的关联和一面之词参见他的回忆文章, “The Rwa-sgreng Conspiracy of 1947,” *Tibetan Studies in Honour of Hugh Richardson: Proceedings of the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Tibetan Studies, Oxford 1919* (Warminster, 1980), Michael Aris and Aung San Suu Kyi, eds., pp. xvi-xx. 关于他和根敦群培被投入狱的有可能的关联参见 Lopez 对根敦群培之生平的多种描述, 详后。

³ 参见 Reinhard Greve, “Tibetforschung im SS-Ahnenerbe,” *Lebens lust und Fremdenfurcht: Ethnologie im Dritten Reich*, ed. Thomas Hauschild, Frankfurt: Suhrkamp, 1995, pp. 168-199; Isrun Engelhardt, “The Nazis of Tibet: A Twentieth Century Myth,” Monica Esposito (ed.), *Images of Tibet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Paris: EHEC, coll. « Études thématiques » (22), vol. I, 2008, pp. 63-96.



唾弃。更有甚者，他们曾经用心研究，并想要代表和表述的那个东方，亦同时遭到了其后辈们的激烈批判，甚至也在有意无意间被无情地解构和抛弃掉了。东方本来就曾经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直接的政治和军事侵略的牺牲品，如今它又因为曾经被西方之东方主义传统下的东方学研究所沾染，故而再次成为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文化侵略的牺牲品。

三、

对西方藏学与生俱来的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本质做了最彻底的揭露和批判的著作无疑是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 Donald S. Lopez, Jr. 先生的名著《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藏传佛教与西方》。¹ 这部名著的影响所及远远超越了西方藏学界，它也曾是美国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一部标杆性作品。在此之前，Lopez 还主编过另一本同样性质的论文集，题为《佛之主事们——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对殖民主义时代西方最著名的几位佛教研究大家，即英国的巴利文和小乘佛教研究权威 Thomas Rhys Davids (1843-1922)、匈裔英籍著名考古学家、探险家斯坦因 (Aurel Stein, 1862-1943)、于西方世界最负盛名的禅学大师、日本学者铃木大拙 (1870-1966)、意大利藏学家图齐、瑞士心理学家荣格 (Carl Gustav Jung, 1875-1961) 等人的生平和学术做了十分尖锐的剖析和批判，还特别对他称为“拜倒在喇嘛脚下的外国人”的他自己那一代美国藏学家们的学术和心路历程做了深刻的反思和解构。²

由于萨义德东方主义理论的重点是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时代欧洲知识界与东方的交涉和互动，以及他们对东方之接受和表述的总结、反思和批判，所以，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对象主要是针对欧洲的东方学和东方学家们。然而，Lopez 以东方主义理论为武器对西方藏学研究所做的清算，不但批判了从乔玛开始的欧洲藏学研究，而且还在书中以一专门的章节“领域”(field)，对美国的藏学研究做了尖刻的批评和嘲讽。美国本土藏学起步很晚，它是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才开始形成和发展起来的，而这个年代正是美国新时代运动 (New Age Movement) 如火如荼的时候，它是一个西方世界对来自东方的各种神秘主义思想和传统都充满幻想和热望的时代，藏传佛教从其禅坐 (meditation) 到密修 (tantra)，均深得追求个性自由、解放的新时代人的青睐和喜爱，它给新时代运动提供了很多精神上的动力和养分。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美国藏学开始启动，所以，其主要内容是对藏传佛教的宣扬和研究。

但是，正如石泰安先生的弟子、曾在美国从业的欧洲汉学家司马虚 (Michel Strickmann, 1942-1994) 先生曾经于 1977 年一针见血地指出过的那样，当时在美国出现的很多有关藏传佛教或者密教的著作，“事实上看起来不过是一些教那些活得有点不耐烦了的美国人如何能够放松一点的小册子。”³ 它们与司马虚熟悉的欧洲学术传统中的藏学研究著作之间显然有着很长的一段距离，美国人做藏传佛教研究首先考虑的好像不是学术，而是要替喇嘛们代言，为那些追求身体和精神同时获得自由和解放的新时代美国人提供足够可口、可乐的心灵鸡汤。

正如 Lopez 在《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中所刻画的那样，美国本土藏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现任哥伦比亚大学法主宗喀巴讲习教授的 Robert Thurman (1941-) 先生与其说是一位杰出的藏学家，倒不如说是一位成功的藏传佛教传教士，因为他具有非同寻常的人格魅力，且辩才无碍，所以，他为藏传佛教，特别是其格鲁派 (黄教) 传统，在西方世界的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但是，Thurman 的藏学著作往往会毫不掩饰地显露出藏传佛教中心主义的底色，背离了一位严肃的

¹ *Prisoners of Shangri-la: Tibetan Buddhism and the West*,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² *Curators of the Buddha: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der Colonial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5. 其汉译本《佛之主事们——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8 年。

³ Michel Strickmann, "A Survey of Tibetan Buddhist Studies," *Eastern Buddhist* 10, 1977, p. 128.



宗教学者应该具备的客观和中立的学术理性，他对神话化西藏潮流在西方的出现和泛滥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弗吉尼亚大学教授 Jeffrey Hopkins (1940-) 先生则是美国本土藏学之教学和研究传统的创立者，他培养了包括 Lopez 本人在内的一大批如今在北美诸大学从事藏传佛教教学和研究宗教学者。在 Lopez 看来，Hopkins 建立起来的这个藏学传统与欧美大学等学术机构中的比较宗教学教学和研究传统严重背离，因为它完全照搬了藏传佛教格鲁派寺院学僧的闻思修传统，所以，在他这里培养出来的藏学博士，其实际的佛学水准大概不过是在西藏格鲁派大寺院中受过训练的十几岁的沙弥、学僧就可以达到的水平。可见，这样的教学方法与其说是在美国的大学内培养藏传佛教的学术研究者，倒不如说是将西藏的寺院教学传统引进了美国的大学内，训练和培育的更可能是有能力在西方宣扬和传承藏传佛教的虔诚的信徒。

Lopez 本人当年不但接受了这种藏传佛教寺院式的教学训练，而且还将其投身藏学的学术使命明确为抢救和传承行将在这个世界上消失的最直接、最正统的佛教传统。Lopez 那一代美国藏学家们曾天真地相信只有在那些流亡在印度的西藏喇嘛们的脑袋里才掌握着自释迦牟尼佛化现人间以来一直未曾中断过的要门 (man ngag)，如果这些要门有一天流失了，正宗的佛教传统也就断灭了，而这样的危险随着喇嘛们远离其故土而越来越迫近了，所以，像他这样的西方学生，觉得天降大任于他们了，必须立刻去印度，拜倒在西藏喇嘛们的脚下，将他们口传的要门原原本本地记录下来，再将它们翻译成英文，然后继续传承下去。这是一项十分崇高和神圣的使命，是 Lopez 这样的美国年轻一代学者责无旁贷，应该肩负起的重大责任。显然，今天的 Lopez 是带着明显的自嘲和讽刺的口吻来反思这一段自己亲历的学术经历及其背后的心路历程的，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年在美国从事藏学研究曾经是一件具有远远超越宗教研究之学术价值和意义的、肩负了重大宗教使命和责任的伟大事业。可是，这个样子的藏学研究无疑与欧洲的具有批判理性的、历史学的和语文学的学术传统相距千里万里，甚至真的可以说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不管是对于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发展起来的欧洲传统藏学的解构，还是对于在新时代运动背景中成长起来的美国本土藏学的批判，Lopez 作为一位“内鬼” (insider)，他对业内的脉络、行情，乃至其中的种种套路、勾当，都看得一清二楚，所以，他书中那些对权威和传统充满强烈反讽意味的细节描述和刻薄评论，读来让人觉得既妙趣横生，畅快淋漓，又句句中的，字字见血，具有无与伦比的杀伤力。有年轻的学术同行对他的这本书非常不满，愤怒地谴责 Lopez 对西方，特别是美国藏传佛教研究的批判有失偏颇和极端，认为 Hopkins 所建立的藏学传统并不能代表美国藏学研究的全部，美国还存在有其他别的不同的藏学研究传统。此外，也有人尖锐地批评 Lopez 在书中常常将西藏和藏传佛教与西方人对西藏和藏传佛教的建构混淆在一起，在他解构后者的同时，实际上也把前者一起给解构掉了，所以，Lopez 本人甚至比那些参与建构了香格里拉神话的藏学家们用心更加险恶。¹

这样的批评听起来并非毫无道理，但是，不管是从思想史，还是从学术史的角度来看，上述 Lopez 对西方藏学研究传统的反思和批判无疑都是十分有理和正确的，它对西方东方主义、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思想和行为对于西方之藏学研究传统所带来的负面影响的揭露和批判，可谓入木三分，且振聋发聩，它不但对于西藏学家们反思西方藏学研究之现状，重新思考其今后的发展方向，而且也对于今日西方之普通民众们思考应当如何来正确理解和理性地处理中西方视野中的西藏和西藏问题，都是一帖及时的警醒剂，都将深有启发，故具有十分迫切和重要的现实意义。

四、

¹ 对 Lopez 之《香格里拉的囚徒们》一书的多篇评论和 Lopez 的回应，见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Religion*, Vol. 69, No. 1 (Mar., 2001)。



《香格里拉的囚徒们》的出版使 Lopez 先生即刻名满天下，不但在藏学和佛学领域内一时风光无限，而且也成了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界的名流，成功地从美国学术的边缘打进了中心。此后，他很快又入选为美国文理学院的院士。Lopez 对包括他自己导师在内的学术前辈及其学术传统所做的革命性的批判和解构，彻底打倒了欧美藏学、佛学界的众多前辈学术权威，驱散了萦绕在欧洲东方语文学传统之上的那圈熠熠照人的光环。与此同时，Lopez 也树立起了自己至高无上的学术地位，今日他于学界之地位的崇高，恐怕是他老师 Hopkins 先生所望尘莫及的。

江山代有才人出，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人自有一代人的学术，这是世间学人都应当明白和接受的道理。在这一点上，西方学人显然表现得更加开明和理性，后辈在学术上批评和挑战前辈，这表明的是学术的发展和进步，而不是个人之间的恩怨情仇。记得当年初读《香格里拉的囚徒们》时，我禁不住热血沸腾，觉得处处令我茅塞顿开，从此便成了 Lopez 的忠实粉丝。可大概也是因为读这本书入戏太深的缘故，从那时起我潜意识中便生长出了一个“香格里拉情结”，至今未曾解开。不管是谈学术，还是论人生，我都会情不自禁地想要去解构那个想来应该十分美好，令人无限神往的乌托邦——香格里拉。

岁月荏苒，弹指间又是二十年过去了。不消说，在这二十年间，国际藏学和佛学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新人、新著迭出，硕果累累，十分令人欣喜。这些年来，我读了不少美国新一代藏学家们的著作，特别是继续一本又一本地读着 Lopez 接二连三出版的很多新书，对他的勤奋和高产我发自内心地钦佩和羡慕。可是，那一个 Lopez 式的问题却始终萦绕着我，我总是忍不住想问：今天的我们依然还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我特别想知道今天的藏学家们是否受到了《香格里拉的囚徒们》的启发，已经改弦更辙，真的能够摆脱当今国际社会之主流话语和主流意识形态对他们的影响、期待和设定了；还是 Lopez 的当头棒喝事实上并没有令他们幡然醒悟，今天的藏学研究依然还不过是在构建一个我们自己魂系梦萦、渴望拥有的香格里拉？

2005 年，威廉姆斯学院的 Georges Dreyfus 在其“我们是香格里拉的囚徒吗？东方主义、民族主义和西藏研究”一文中曾尖锐地指出，Lopez 对藏学研究中的东方主义的批评虽然有用，但在有些方面矫枉过正，夸大了东方主义的影响，并将一个封闭的总体性（totality）赋予西藏文化，以非历史的眼光将西藏文化固化为在西方文明介入下保持一成不变的实体。与此同时，他并未提供任何取代东方主义的解决问题之道，相反，在其自身的学术实践上仍然承袭着他所戮力批判的传统。¹无疑 Dreyfus 对 Lopez 的批评是十分有见地的。显然，像 Lopez 这样的一批后现代 / 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的大家们，在解构其前辈的学术时，干得非常干净、彻底和漂亮，可是，在此之后，他们却并没有用心来建构起一套非东方主义、非帝国主义 / 殖民主义的新的学术方法，也没有设想出一种更为正确、公平和友善地对待和理解东方的立场、态度和方式。事实上，在那些激进地批判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西方学者身上，我们并没有较少地感受到按理说只能在那些被他们激烈地批判的前辈学人身上才能感受到的那种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气息。与秋风扫落叶般的解构相比，筚路蓝缕、一步一个脚印的建构实在是太不容易了。我们只能衷心期待那些彻底解构了其前代之学术的新权威们也能够为未来的学术和学术的未来着想，建设性地设定新的学术方向和方法；衷心希望他们能够带着他们一贯的批判精神，用心来体会一下以下这条我年少时曾经天天背诵的毛主席语录：“不破不立，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也！”

迄今为止，已有一批萨义德式的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家们很彻底地解构了东方语文学的客观性和权威性，令我们从此对自己曾经服膺的欧洲东方学传统产生了严重的怀疑和反感。可是，在东方语文学这个学术神话被破除之后，我们不得不要考虑这样一个问题，即今天我们到底应该采用哪一种更靠谱、更正确的学术方法来研究东方呢？与 Lopez《香格里拉的囚徒们》这本书类似

¹ “Are We Prisoners of Shangrila? Orientalism, Nationalism, and the Study of Tibe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Tibetan Studies*, No. 1, October 2005, pp. 1-21.



的作品，我还读过不少，例如哥伦比亚大学梵文、印度学教授 Sheldon Pollock 先生曾以“深度东方主义”（Deep Orientalism）为题发表过长篇文章，批判和解构了可为欧洲语文学传统之典范的德国印度学研究，他把几代德国印度学家都毫不留情地指责为纳粹的走狗和帮凶，使得本来备受学界推崇的德国印度学研究一夜之间失去了昔日的光彩。¹所以，当 Pollock 近年来四出游说，呼吁世界学术要“重回语文学”时，有德国新锐印度学家站出来忿忿不平地发问：你[丫]到底想要我们回到哪个语文学？我告诉你吧，我们从来就没有离开过语文学！²

让我们重新回到藏学这个主题上来！或许正是因为没有找到一种正确和一致的学术方法，当下的国际藏学，看起来好像已经失去了明确的目标和方向，也没有大家都认同的学术分野、规范和标准，看似百花齐放，实则一盘散沙。可见，藏学和西藏一样，它从来就不可能是一个世外桃源，不是香格里拉。Lopez 们告诉我们藏学研究的目的绝对不是为了要去找寻或者构建一个香格里拉，可是他们并没有告诉我们应该怎样来研究西藏和藏传佛教才可以保证我们不再茫然陷入香格里拉这个囚牢。或许正因为 Lopez 们还没有为西方藏学家们设计出一种比语文学更可靠的学术方法，所以，这二十年间美国藏学研究似乎依然没有完全摆脱香格里拉的迷思和陷阱，我们大概也还不敢期待今天的藏学家们已经不再是香格里拉的囚徒了。

五、

如果我们可以把 Robert Thurman 和 Jeffrey Hopkins 二位先生确认为美国本土藏学研究传统的建立者的话，那么 Donald Lopez, Jr. 先生绝对是第二代美国本土藏学家中最杰出的代表。Lopez 无疑是一位世界级或者现象级的超级学霸，一般的美国教授出上两本书，拿到正教授职位就差不多已经走完了整个学术生涯，而 Lopez 即使在名满天下之后，依然被甲精进，笔耕不倦，差不多每年都有一本或者二本新著出版，令世人惊艳和钦佩。从 Lopez 迄今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中发表的大量著作中，我们或可窥见美国藏学研究的整体面貌及其鲜明特色，而仔细阅读他近二十年来的新作，则或可帮助我们观察和分析 Lopez 在犀利地解构了其前辈之藏学研究之后，自己是否真的已经彻底摆脱了香格里拉的精神束缚，究竟有没有寻找到可以引领国际藏学走出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之泥潭而得大自在的一条菩提大道。

Lopez 将自己所从事的学术研究细分成四个领域，第一个领域是利用藏文翻译和藏传佛教上师所造诸释论，来研究印度佛教经院哲学，特别是大乘佛教哲学思想。他在这方面的著作有《自续派[中观]研究》（*A Study of Svatantrika*, Snow Lion Publications, 1987 / 2016）、《释心经：印度和西藏之诸释论》（*The Heart Sūtra Explained: Indian and Tibetan Commentaries*, SUNY Press, 1987）、《论空：心经之诸妙用》（*Elaborations on Emptiness: Uses of the Heart Sūtra*,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而目前他还在进行中的一个研究项目是翻译章嘉呼图克图乳贝多吉（*ICang skya Rol pa'i rdo rje*, 1717-1786）的一部教法源流。Lopez 的第二个研究领域是欧洲人与佛教交往的历史，研究佛教在亚洲和西方之间发展出来的影响网络，以及从中被制造出来的那个被称为“现代佛教”的东西。他在这个领域的著作极多，前述他的那部名著《香格里拉的囚徒们》和他主编的那本《佛之主事者：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都属于他在这个领域的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关于佛教与西方的交涉的研究，Lopez 很早就开始关心，早在 1987 年他就曾和他的同事编集了一部由三位神学家和三位佛学家分别讨论基督和菩萨于各自宗教传统中之重要意义的论文集，题为《基督和菩萨》（*The Christ and the Bodhisattva*, SUNY Press, 1987）。此后，Lopez

¹ Sheldon Pollock, “Deep Orientalism? Notes on Sanskrit and Power Beyond the Raj,” *Orientalism and the Postcolonial Predicament: Perspectives on South Asia*, pp. 76-133.

² Jürgen Hanneder, “‘Zukunftsphilologie’ oder die nächste M[eth]ode,”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ändischen Gesellschaften*, 163, 1, 2013, pp. 159-172.



自己不断地回到这个课题的研究上来，出版了大量的作品。其中有：《佛教与科学：给困惑者的指南》（*Buddhism and Science: A Guide for the Perplexed*,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西藏死亡书传》（*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A Biogra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科学的佛陀：他的短暂和幸福的生活》（*The Scientific Buddha: His Short and Happy Life*,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2）；《从石头到肉体：佛陀简史》（*From Stone to Flesh: A Brief History of the Buddh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3）；《寻找基督佛陀：一位亚洲的贤者是如何成为中世纪的圣人的》（*In Search of the Christian Buddha: How an Asian Sage became a Medieval Saint*, with Peggy McCracken, W. W. Norton & Company, 2014）；《妙法莲华经传》（*The Lotus Sūtra: A Biogra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6）；《一位东方偶像的希有传奇：早期欧洲佛陀肖像集》（*Strange Tales of an Oriental Idol: An Anthology of Early European Portrayals of the Buddh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驱散黑暗：一位耶稣会士对西藏灵魂的追寻》（*Dispelling the Darkness: A Jesuit's Quest for the Soul of Tibet*,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7）。他甚至还和法国人类学学者 Katia Buffetrille 女士合作，将欧洲早期著名佛教研究大家 Eugène Burnouf（1801-1852）的《印度佛教史入门》（*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Indian Buddh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翻译成英文出版。

Lopez 的第三个研究领域集中在他对二十世纪西藏最有名的知识分子、疯僧根敦群培（dGe 'dun chos spel, 1903-1951）的研究上。根敦群培于今已经是一个传奇，是当代神话西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被认为是西藏近代最著名的诗人、画家、散文家、历史学家、哲学家、旅行家和情色专家，而 Lopez 可被认为是当今世界研究根敦群培的头号专家，出版了一系列的著作。其中有《疯子的中道：西藏僧人根敦群培对实性的反思》（*The Madman's Middle Way: Reflections on Reality of the Tibetan Monk Gendun Chope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7）、《在褪了色的智慧的森林中：双语版根敦群培诗 104 首》（*In the Forest of Faded Wisdom: 104 Poems by Gendun Chopel, A Bilingual Editi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根敦群培：西藏的第一位现代艺术家》（*Gendun Chopel: Tibet's First Modern Artist*, Serindia Publications, 2013）、《金颗粒：一位世界主义旅行家的传奇》（*Grains of Gold: Tales of a Cosmopolitan Traveler*, with Thupten Jinpa,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4）、《激情书：一部爱和性的藏文指南书》（*The Passion Book: A Tibetan Guide to Love and Sex*,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8）、《根敦群培：西藏的现代空想家》（*Gendun Chopel: Tibet's Modern Visionary*, Shambhala, 2018）等等。

Lopez 的第四个学术专注点是佛学研究的成果，通过翻译、编集论文集和参考书等，传递给更多的读者，特别是其他专业领域的学者和学生。Lopez 既是一位极有学术眼光的佛教学者，同时也是一位非常有号召力和影响力的学术组织者，他在学术普及这个领域内所付出的努力，十分令人佩服，为佛教于西方的传播和佛教研究在西方教学和科研体系内的普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Lopez 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推出的一套《普林斯顿宗教读本》（*Princeton Readings in Religions*）丛书的总主编，其中由他本人实际主编的就有《实践中的佛教》（*Buddhism in Practice*, 1995/2007）、《实践中的印度宗教》（*Religions of India in Practice*, 1995）、《实践中的西藏宗教》（*Religions of Tibet in Practice*, 1997/2007）、《实践中的中国宗教》（*Religions of China in Practice*, 1996）、《实践中的亚洲宗教：导论》（*Asian Religions in Practice: An Introduction*, 1999）、《实践中的亚洲宗教：论集》（*Religions of Asia in Practice: An Anthology*, 2002）等等，每一本都是煌煌巨著，是现今美国大学宗教系、哲学系学生必备的重要参考教材。此外，Lopez 还和 Robert Buswell 教授一起编写了一部篇幅巨大的《普林斯顿佛教辞典》（*The Princeton Dictionary of Buddhis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和 Jack Miles 先生合作编集了一部同样卷帙浩繁的《诺顿世界宗教论集：佛教》（*The Norton Anthology of World Religions: Buddhism*, W.

W. Norton & Company, 2017)。除此之外, Lopez 还单独编写了多部面向大众的佛教普及读本, 例如《佛教: 导论和指南》(*Buddhism: An Introduction and Guide*, Allen Lane, 2001)、《一部现代佛教圣经: 来自东方和西方的基楚读物》(*A Modern Buddhist Bible: Essential Readings from East and West*, Beacon Press, 2002)、《佛教经典》(*Buddhist Scriptures*, Penguin Classics, 2004)、《佛教故事: 它的历史和教法的简明指南》(*Story of Buddhism: A Concise Guide of Its History & Teachings*, HarperOne, 2009) 等等。Lopez 还编集了几部于学界产生了持久影响的重要学术论文集, 除了前面提到的那部《佛之主事们: 殖民主义下的佛教研究》以外, 还有一部题为《佛教诠释学》(*Buddhist Hermeneutics*,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2) 的论文集, 也是一部于美国佛教研究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要著作。还有, Lopez 编集的《佛教研究关键词》(*Critical Terms for the Study of Buddhis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是西方从事佛教研究的学者和学生们必备于案头的一部手册。Lopez 最近又出版了一部题为《惠照的旅程: 佛教的世界》(*Hyecho's Journey: The World of Buddhism*,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7) 的新书, 实在不知道应该把它归入上述四类著作中的哪一类。

综上所述, Lopez 著作、编集和翻译的作品有近四十种之多, 如此勤奋、高产的佛教学者恐怕是今世绝无仅有的, 这是他首先值得我们钦佩的超人般的卓越之处。Lopez 的著作涉及的领域是如此广泛, 无疑能帮助其学术同行们增长见识, 拓宽视野; 他讨论问题的视角是如此新颖、独特, 常常能给人以意想不到的启发; 他的文风又是如此的激情和灵动, 似行云流水, 读来令人愉悦、舒畅。总而言之, Lopez 之学术人生的巨大成功绝非偶然, 他对国际藏学、佛学研究所做出的巨大贡献, 理应得到世人的承认、欣赏和尊重。

然而, 若从学术史的角度专业地来评论他的这些作品的话, 我们或可以这样以为, 他的第一和第三类别的作品, 与传统藏学联系最为紧密, 但它们从内容到方法, 基本上都继承了被他严厉批评过的由其导师 Hopkins 所建立的美国本土藏学之学术传统, 反映出了“拜倒在喇嘛脚下”的那一代美国学者的典型学术风格, 其间充满了与欧洲藏学传统完全不同的鲜明的美国特色。若以学术言之, 则颇多语文学方面的瑕疵; 若以思想言之, 则很难说它们已经彻底跳出了香格里拉的陷阱, 不再为神话化藏传佛教背书了。

例如, 在 Lopez 这一系列与根敦群培相关的著作中, 影响最大的莫过于《疯子的中道》, 而该书的研究对象——《中观甚深要点集萃善说·龙树密意庄严》是最能体现根敦群培佛学思想, 且极富争议的吸睛式的中观论著。这部表面上看起来颇具颠覆性的论著, 常被后人用来当作证实根敦群培乃一位离经叛道的现代性先驱的一个证据。然而, 《龙树密意庄严》除了在写作风格上打破了藏土传统的造论模式外, 在内容和思想上却并没有什么新意, 其颠覆性实在无从谈起。论中所承继的仍然是宗喀巴之前宁玛、萨迦、噶举各派的“前期(中观)师”(snga rabs pa)之见地, 它无非是借对以格鲁派为代表的“后期(中观)师”(phyi rabs pa)的批判与讽刺来达成对“前期中观”的回归。Lopez 虽然也明确地点出了这一点, 但并没有将根敦群培放置在整个印藏中观学说的历史演进长河中加以考察, 并没有为读者梳理、呈现其中观思想的众多来源, 而这却恰恰是帮助读者穿过这位“中观犀利哥”天马行空的文字旋风、洞察其背后之根本立场所必需的。全书对根敦群培之前藏土早已存在的对格鲁派的批评只字不提, 却仅在翻译之余逐段提供辅助读者理解的复述式解读, 故很难说 Lopez 于此已跳出传统藏土注经模式的窠臼。此外, Lopez 对现代性的引入显得既无必要, 且缺乏说服力。书中的最后一章虽用大量篇幅来论述《龙树密意庄严》中所体现的现代性, 然却并未就具体的讨论对象为现代性给出明确而恰当的定义。而《龙树密意庄严》虽然行文风格自由且充满反讽, 但这并不足以支持 Lopez 书中提出的那些论点。总之, Lopez 有关根敦群培的这一系列著作并没有充分还原根敦群培所植根的宗教历史语境, 也未完全避免对根敦群培的增益与拔高, 相反, 它们在想象、偶像化和神化根敦群培的进程上, 起到了推波助澜

的作用。¹

第二种类的著作显然是 Lopez 之所有学术作品中最出彩的部分，也是他的学术中最精华、贡献最大的部分，但是，它们离传统藏学较远，它们与后殖民主义文化批评和东西文化交流史研究的关联更为密切，而其中最优秀的作品依然还是他的那部名著——《香格里拉的囚徒们》。Lopez 的第四类作品都是关于佛教和佛学研究的通俗著作，它们对于当下西方学界之佛教知识的普及和佛教研究基本技能的培养具有无可替代的重要意义，但它们中的大部分同样亦与藏学没有特别紧密的关系。

总而言之，虽然 Lopez 非常犀利地解构了以语文学为主导的欧洲藏学研究传统，同时也批判了在新时代运动背景下发展起来的美国本土藏学传统，但是，他自己所做的藏学研究事实上并没有背离美国本土藏学的传统，相反依然凸显出其鲜明的特色，Lopez 对藏学旧传统的激烈批判不过是他从事后殖民主义文化批判的一个重大创新和突破，在此之后，他并没有用心为藏学研究设计和指明一条在政治上能够彻底摆脱东方主义和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束缚和影响，在学术上既能够保持客观、理性，又鼓励批评、革新的正确道路。此外，不得不说的是，美国的本土藏学研究，确切地说是藏传佛教研究，本身就是新时代运动的产物，是美国思想、精神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而近年来又通过 Lopez 的努力和成就，它与美国主流学术的关联变得越来越密切了，或已成为美国主流学术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与此同时，它与西藏、藏传佛教和传统藏学研究之间的距离似乎越来越远了，远到了快摸不着边际的地步了。

六、

三十多年前，当我刚刚敲开藏学这扇沉重的大门时，门内还见不到很多美国藏学家的身影。当年人们提到美国藏学时，或许会说起那位英年早逝的 Turrell V. Wylie (1927-1984) 教授，他是图齐的学生，翻译了《世界境域志》，还确定了藏文拉丁转写的规则；²人们或许也会谈到旅美华裔学者李方桂 (1902-1987) 和张琨 (1917-2017) 二位先生，他们都在美国名牌大学内教学和研究藏语文，而李方桂用英文发表的对吐蕃金石、碑铭的研究文章，也在国际藏学界占一席之地。³那时 Lopez 才博士毕业不久，Hopkins 和 Thurman 二位先生或虽已崭露头角，但孤陋寡闻如我者对他们闻所未闻。

三十余年过去，这藏学世界已彻底改变了模样。面对眼前这新的景象，我常不由自主地要哼唱崔健的另一首歌：“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今天，Hopkins 和 Thurman 是美国本土藏学的泰山北斗，美国也早已是国际藏学重镇，其影响力与日俱增。事实上，美国藏学从来不只是被 Lopez 批判的、于此被我称为“美国本土藏学”这一种传统。美国藏学萌芽时期推崇的同样是欧洲的语文学学术传统，例如在西雅图华盛顿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开始的藏学研究都以欧洲传统为主导，以后在哈佛大学发展起来的藏学、印藏佛教研究也是如此。即便是在 Thurman 主导下的哥伦比亚大学的藏学和佛教研究，它也依然部分地保留着欧洲语文学的传统。及至今日，美国藏学与世界其他地方一样，也呈百花齐放的多元景象，人文、社科各个领域的学者都有可能从事西藏研究，其研究方法也各随其所擅学科而有不同的取径。但是，美国藏学的核心力量和最好代表无疑还是在近三十余年间由 Hopkins 和 Thurman 二位具有非凡人格魅力 (charisma) 的学

¹ 此段对 Lopez 《疯子的中道》一书的评论蒙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杨杰博士添加，于此谨誌谢意！

² T. V. Wylie, "A Standard System of Tibetan Transcription,"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Vol. 22) p. 261-267; *The geography of Tibet according to the 'Dzam-gling-rgyas-bshad: text and English translation*, Roma: In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 1962.

³ Fang-kuei Li, "The Inscriptions of the Sino-Tibetan Treaty of 821-822". *T'oung p'ao* 44, 1956, pp. 1-99. Fang-kuei Li, with W. South Coblin, *A study of the old Tibetan inscriptions* (Special publications / Institute of History and Philology, Academia Sinica, Taipei, 1987.

术导师培育和发展起来的那支美国本土藏传佛教研究队伍。他们人多势众，根深叶茂，不但占据了美国国内大部分的藏学学术平台，而且也活跃于国际藏学舞台，其学术影响力越来越大。

就在这三十余年间，美国本土藏学内部也出现了一些重要和显著的变化。如前所述，Lopez 的学术既有对 Hopkins 之学术的继承，也有通过对它的反思和批判而获得的巨大进步。同样，Lopez 的同门晚辈或者他的弟子对他的学术也有继承和扬弃，也有变化和进步。就其总的趋势而言，美国本土藏学从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那种在新时代运动背景下所做的佛教宣传和传播型学术发端，以后逐渐与美国式的宗教学或者比较宗教学学科的学术理念和规范相整合，走出了一条别具特色的美国式的藏学道路。与美国主流学术的其它学科一样，至今美国的藏学研究一般都要强调所研究课题具有的问题意识，并要求对它的学术处理必须符合某种主流的学术范式。与此同时，美国藏学脱离了其最初那种制造新时代运动所需要的佛教读本的模式，加强了语文学的训练和对学术规范的要求，使其成为一门可被主流学术认可的学问。在比 Lopez 更年轻一代的藏传佛教研究学者中，有不少人写出了非常优秀的学术作品。例如佛罗里达州立大学的 Bryan J. Cuevas 教授（Hopkins 的弟子）的《西藏死亡书秘史》、¹ 芝加哥大学的 Christian Wedemeyer 教授（Thurman 的弟子）的《为密乘佛教正名：在印度传统中的历史、符号学和违规》、² 加州大学柏克莱校区的 Jacob Dalton 教授（Lopez 的弟子）的《伏魔：藏传佛教中的暴力和解脱》等等，³ 在我看来都是近年来藏传佛教研究领域内出现的值得称赞的上乘之作。

不知不觉间，进入藏学领域已经三十余年了。这么些年来，我对自己的最高期待从来不过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预流”，可今天我越来越觉得就是要达到这个起码的目标其实也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因为这个“流”不但是一个国际的“流”、一个世界的“流”，而且它也一直在变化、发展和进步之中。如前文所述，初入门时，我对东方语文学推崇备至，用心追摹，惟恐因自己驽钝而辱没了中德两家师门；后来读到 Lopez 等对东方语文学传统中的西方藏学研究所作的解构性的犀利文字，又觉得挺有道理，一度曾对语文学产生了怀疑。今天既喜读欧洲语文学家们凿凿有据的著作，也不烦读美国藏学家们激情灵动的作品，有时甚至很难确定自己到底更喜欢哪种风格的学术文章。我说我喜欢 Wedemeyer 的《为密教正名》，可听说有日本的佛教语文学说 Wedemeyer 的书不是 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而是 Making Non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我说我喜欢 Dalton 的《伏魔》，可有我十分佩服的英国敦煌古藏文佛教文献研究的权威亲口对我说 Dalton 书中对那些敦煌古藏佛教文献的解读错得实在非常离谱。可想而知，学术研究能在完美的语文学和启人心智的理论、思想之间达到一种有高度的平衡，世上大概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位真正的高手才能够做得到。今天国人喜谈学术要与国际接轨，我亦深以为是。可是，国际学术哪里只有一根正确的轨道等着我们去接呢？我与国际藏学打了三十余年的交道，到如今却越来越不明白中国藏学到底应该和哪根国际轨道接轨呢？做学问必须“预流”，这听起来不难，但真做起来可实在是一件让人终生必须十分努力地付出和学习的苦差使。

以上对近三十余年来美国本土藏学的管窥蠡测给我的一点启发是：藏学研究绝对应该回到西藏和藏学本身，它不应该是任何形式的东方主义、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和民族主义等等思潮和行动影响下的一种关于西藏和藏传佛教的话语和学术建构，藏学研究的目的是为了顺应某一种思想、政治、权力和利益而建构出一个人人们喜爱或者期待的、虚拟的西藏和藏传佛教，而是应该以客观、理性的态度，带着批评的精神，来研读藏文文本，观察西藏的历史和现实，尽可能真实地还原和揭示西藏之复杂和曲折的历史，描述其丰富多彩的文化传统和社会面貌。为此我们或更应该回到起点，从刻苦学习藏语文开始，努力读懂不同形式的藏文文本，在西藏文明自己的语境中

¹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Tibetan Book of the Dea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6.

² *Making Sense of Tantric Buddhism: History, Semiology, and Transgression in the Indian Traditions*,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2/2014.

³ *The Taming of the Demons: Violence and Liberation in Tibetan Buddhism*,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来寻求正确理解藏文文献和西藏人文社会的方法，以达到最大程度的对西藏文化和社会的理解。为了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可以采用任何可取的学术方法，但是藏学研究必须坚持的最基本的原则只有一条，那就是正确理解，而理解必须从细致的语文学实践出发才有希望达成。

三十余年来，我一直喜欢崔健的歌，因为它让人在悲愤中依然坚持振作，在解构某种信念时还给人以升起另一种信念的希望，充满了正能量。三十年余间，我在藏学中学步，步履蹒跚，曾为我过去想象中的那座象牙塔和寻求中的那个香格里拉的崩塌和消逝而悲愤，但今天我依然对藏学之象牙塔和香格里拉的重建充满了期待和向往。“光阴匆匆似流水，它一去不再回，不再有那痛苦的梦，和无用的忏悔。我要洗清身上的尘灰和脸上的泪水，我要骑在那骏马上，把时光紧紧追。”这是崔健《浪子归》的结尾，我听着觉得它催人振作，也给人以希望！

【论 文】

族群多样性与地方经济增长

——来自中国城市层面的证据¹

王振宇、顾昕²

摘要：族群多样性的经济影响及其发生机制，是经济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前沿研究领域。文章利用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和抽样调查资料，构建了中国 300 多个城市族群多样性的面板数据，通过计量分析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降低了地方经济增长率。在考察了测量指标的影响和内生性问题后，结论依然稳健。通过对影响机制的探讨，文章发现：高的族群多样性显著增大了语言沟通成本，降低了私有部门投资率；另一方面，公有部门投资率不受族群多样性的影响，人均中央财政转移支付和族群多样性显著正相关，这两者缓解了族群多样性的不利影响。以上发现，一方面为族群多样性经济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实证证据；另一方面也为中国地方经济增长的差异性提供了一个新的解释，并衍生出新的学术课题和政策意涵。

关键词：族群多样性 经济增长 语言 投资 转移支付

一、引 言

族群多样性 (ethnic diversity) 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及其发生机制，是近 20 年来经济学中一个方兴未艾的前沿研究领域 (Easterly 和 Levine, 1997; Alesina, Baqir 和 Easterly, 1999; Alesina 和 Ferrara, 2005)。在当今世界，族群多样性不仅呈现在国家层面 (单一族群国家早已不复存在)，而且也呈现在地区、社区 (社群)、组织甚至家庭之中。族群多样性通过族群认同等因素，引致偏好异质性，影响着个体的微观经济选择，进而对集体的宏观经济表现产生了深刻影响。

经由长期的历史演进和融合，中国成为一个多族群国家。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央政府自 1950 年代起，识别并确认了 56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据绝对多数，而其他 55 个民族被称为“少数民族”。此外，官方还确认有近 50 多个未识别民族。不同族群的人口不均衡地混居在不同的地方，不少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是中国众所周知的贫困地区。因此，在中国的不同地区，族群多样性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性，这就构成了一个天然的社会科学实验场。族群多样性如何影响各地的经

¹ 本文刊发于《财经研究》第 44 卷第 2 期。

² 王振宇，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博士研究生；顾昕，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本文通讯作者。

